

 Social Sciences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II)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文萃

第三辑 · 2017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编辑部 组编

 中国言实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II)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文萃

第三辑 · 2017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编辑部 组编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文萃. 第三辑, 2017 /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编辑部 组编.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171-2493-1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1953 号

出 版 人: 王昕朋

总 监 制: 朱艳华

责任编辑: 张 丽 冯 章

出版统筹: 胡 明

责任印刷: 佟贵兆

封面设计: 锦 瑟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总编室) 64924716(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26.75 印张

字 数 620 千字

定 价 110.00 元 ISBN 978-7-5171-2493-1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文萃

第三辑·2017

编委会主任：王炳林

编委会副主任：赵 军 杨海英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云涛 王群瑛 毛殊凡 朱志伟

汪立峰 李光伟 李彦姝 何 晶

目 录

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调适”	杜艳华 / 1
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几个重要问题再省思	李成旺 / 14
人的精神境界几个重要表征	徐 斌 陈国娜 / 31
关于深化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的几个问题	王炳林 房 正 / 40
话语体系的本质属性、发展趋势与内在张力	
——兼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立场和原则	郭 湛 桑明旭 / 56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 / 69	
创新发展的科学内涵和实践价值	覃 川 / 69
怎样理解协调发展	孙代尧 何海根 / 75
推进绿色发展势在必行	肖 巍 / 81
开放发展：中国共产党发展新飞跃	孙兰英 / 87
实现共享发展的三个维度	于 昆 / 92
论思想互动微交往	骆郁廷 高 飞 / 99
近代中国逻辑思想研究源论	翟锦程 / 108
哲学对话与中国精神的重建	张汝伦 / 127
名字、概念游戏和语言劳动分工	
——鲸案的哲学讨论	李大强 林康廷 / 138

现代逻辑视域下实质真理论研究	刘靖贤 陈 波 / 151
哲学的特性及其当代形态	孙正聿 / 174
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与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	李维武 / 182
尼采、虚无主义与形而上学	
——基于海德格尔《尼采》的解读	张志伟 / 194
强力的意志与意志的强力	
——海德格尔与德勒兹对尼采的不同解读	李科林 / 205
从明成祖的政治权衡论官修《大全》之编纂	李晓明 董恩林 / 219
“归安悍气”：以陆名扬案为中心的解读	晏爱红 / 233
清嘉道时期的环境恶化及其影响	朱 泚 黄兴涛 / 251
晚清中外条约关系的基本理论探析	李育民 / 264
反美主义与欧洲联合中认同的强化	王晓德 / 283
清末官员海外游历游学的历史考察	徐保安 / 299
民国北京城市消费的等级与阶层	王建伟 / 318
“丝绸之路”上的人物往来与唐诗境界的开拓	杨晓霭 / 335
纯文学史观与中国文学史写作	蒋原伦 孙 权 / 352
新发展理念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意蕴	顾海良 / 367
在创新发展中解决结构失衡问题	刘 伟 / 37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总需求管理的关系探析	陈小亮 陈彦斌 / 375
需求结构升级转换背景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 / 390	
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	简新华 余 江 / 402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 年总目录	/ 412
投稿须知	/ 417
后 记	/ 419

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调适”

杜艳华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其“调适”主要是自我“调适”，即“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内涵主要涉及自我纠错，消除党的机体病变，路线、方针、政策的调整，理论创新等。分析和研究这一课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自我“调适”对中国共产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大凡政党都具有政治目标，而为达其政治目标必然制定自己的理论、纲领、路线、政策等。然而，组织的存在及理论的实施需要与其主客观条件相适应。这种适应往往不是天然的，或者一蹴而就的。因此，从自我“调适”角度看，组织或政党的“调适”能力就成为一种必备素质。

（一）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土壤及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其必须自我“调适”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近代中国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受封建制度压迫；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受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长期处于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压迫和围剿之中，没有合法地位，只能在秘密状态下活动。尽管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国民党与共产党有过联合，某些民主党派在反对国民党独裁以及和外国帝国主义斗争中也与共产党有过合作，但当时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决定中国共产党与这些政党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相互监督和平等竞争的关系。事实上，来自外部的力量更多是一种破坏力量。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右派势力就害怕共产党发展壮大而极力加以压制。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中共党员人数就由五万七千多锐减到一万多。即使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也以各种形式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必须极谨慎、极仔细、极留心地观察时局变化，及时调整、转变自己的战略、路线及思想理论，努力提升自己应对各

种风险的能力，而这种转变、调整和提高必须依靠自觉意识和自我行动来实现。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制度建设重视程度和实践经验不足，一方面发生了个人崇拜、阶级斗争扩大化等诸多失误，并有像“文化大革命”这样长期的错误；同时，自身还出现了腐败、脱离群众、精神懈怠等严重危险。另一方面，这些错误和危险最终都是靠中国共产党自己解决的，而不是依靠其他政治力量来解决的。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具备自我纠错、自我净化、自我革新和自我完善的能力，社会主义事业就不会成功。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其整个发展历程中所遇到的一切生存和发展危机，尤其来源于组织内部的危机，可以靠自我“调适”来解决。也正因如此，邓小平说，“一个党犯错误是难免的，就是犯了错误，也要由自己去总结，自己去解决问题，这样才靠得住。”^①这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经验的一个深刻总结，也是对党的生存规律科学认识的结果。

（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特点决定其必须适时运用自我“调适”武器

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明确提出了自己的革命纲领，坚定地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以拯救民族危亡、改变中国命运为己任，并立即投入民族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充分表现了先进政党的优势。但同时，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又有明显的先天不足。因此，自我“调适”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须臾不可离开的武器。

第一，虽然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不久（在五四运动时才有很少的输入），不像欧洲各国，马克思主义的传布已有了近百年的历史。”^②从苏俄的建党活动看，其马克思主义团体的成立到党的创建工作完成，期间长达20年。而在中国，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到共产党的诞生，只用了3年时间。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受到燃眉之急的民族民主革命形势所迫，立即投入革命实践中，没有充足的时间专注理论研究工作。所以，党成立初期及此后较长的时期内都表现出对马列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缺乏统一的认识和把握。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没有完全搞清楚。这种先天不足是导致党在各个时期发生错误的主要根源，也是中国共产党离不开自我“调适”这一武器的内在原因之一。

第二，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其组织成分主要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构成，这样党内必然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正如1929年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所指出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1页。

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①。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自我改造的过程，即通过自我净化、自我革新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过程。没有这种“改造”，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成长环境极为特殊，最突出的是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这使党的组织被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包围着。另外，中国封建主义传统根深蒂固，其思想影响无处不在。可以说，在这种复杂和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建设无产阶级政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罕见的。这种特殊性也是导致中国共产党犯“左”倾或右倾错误的根源之一。这种特殊性要求中国共产党将自我“调适”作为常态化的任务来对待。

此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党员的成分依然具有多样性和复杂化的特点。因此，党内难免出现思想理论和认识上的分歧以至错误，如果党不能及时洞悉内部思想的动向而加以“调适”，防止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失误，就无法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党自身的特点要求其必须始终掌握并运用自我“调适”武器。

（三）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艰巨性及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其必须自我“调适”

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多重使命。然而，在特殊的国情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要完成其使命，需要历经艰难探索，甚至付出巨大代价。是否具备自我“调适”能力就成为其领导革命和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所面临的历史条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不同。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进程。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②，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近代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既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理论，也不能走苏联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而“探索”和“开辟”自然隐含着走弯路以至犯错误的风险，这就决定了自我“调适”对于中国革命及党自身发展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必须领导社会主义建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8页。

设事业取得成功，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极为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起步的，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建设条件相去甚远，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相比也存在很大差别，因此，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可参照。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①显然，“摸索”过程就是一个自我“调适”过程。

二、自我“调适”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之道

自我“调适”在中国共产党成长历程中的每一个关键环节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论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历史的转折，还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党和红军的转危为安，或者是党带领全国人民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中走出来，党的自我“调适”都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末以来，面对世情、党情、国情的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要巩固执政地位，实现长期执政，必须进行自我净化、自我革新。于是，通过学习型政党建设、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制度反腐等途径消除连续执政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怠惰、脱离群众、能力不足等惰性因素。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举措是典型的自我“调适”。因而，我们可以将自我“调适”称为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之道。自我“调适”对解决中国共产党生存和发展的以下四大关键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通过自我纠错及时化解了威胁自身生命的危险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因为自身错误造成的危险。如大革命后期，由于党犯了右倾错误，导致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党人遭到屠杀，其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给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损失。新中国成立后，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也犯过不少错误。从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犯“左”的错误开始，直到1976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②这其中，任何一次错误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都会彻底断送党的事业。然而，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具备自我纠错的能力，才有了党的历史上的一次又一次重大转折，并在不断纠错中走向成熟。例如，遵义会议后，“左”倾路线在政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8~25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3~254页。

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克服，中国革命走上正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彻底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进而带来了20世纪中国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变，国家的前途命运发生重大转机，中国共产党也从此走向新的天地。

（二）靠自我“调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在党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调适”角度来看，这两大理论成果是党不断进行自我“调适”的结果。第一，两大理论成果本身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否定与克服。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①。教条主义脱离具体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障碍。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在此背景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同这种错误倾向进行坚决斗争并深刻总结了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则是全党在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解放了思想，克服了照抄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纠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基础上，又经过30多年的实践探索逐步创立起来的。因此，“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②

第二，两大理论成果内涵了中国共产党自我“调适”的方式方法。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调适”，特别是克服党内的错误思想，主要通过思想教育方法和整风方式进行。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党所处的时代条件指出，“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采取教育，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进其无产阶级化，是完全必要的。”^③同时，还把掌握思想教育看成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因此，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的任务主要是克服非无产阶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0页。

②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12月19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96页。

级思想。例如，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30年代，针对党内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存在的照搬苏联经验的错误思想，党反复强调反对本本主义。遵义会议后，党的自我“调适”依然是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此后，经过延安整风，党内的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得到了有效克服。至今，党依然把思想教育视为自我“调适”的重要方法。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整风运动，大的整风就有延安整风、建国初期的整风、1957年的整风以及新时期具有整风意义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这些整风，除了1957年的开门整风外，其他均属自我“调适”的典型形式。这些整风，对于消除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净化党的肌体产生了重要作用。例如，延安整风针对抗战时期党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党员成分复杂、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入党内的实际，决定把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作为整风的主要任务。经过延安整风，有力地清算了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思想，解放了思想，并达到了党内的团结和统一，极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第三，两大理论成果表明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他要求全党“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①。此后，党中央历届主要领导人都反复强调并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命题。两大理论成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萌芽于大革命时期，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探索逐步形成，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由此，中国共产党也走向成熟，其自我“调适”能力也达到较高水平。1938年，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说：“十七年来，我们的党，一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斗争的武器，从两方面反对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②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有过曲折。直到20世纪70年代，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纠正错误之后，又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探索，才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中国共产党不仅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其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也发生重大转变。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适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成功地应对面临的种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0页。

种挑战，从而维系执政地位。这些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政党。

第四，两大理论成果蕴含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创新特征。与时俱进、持续不断的理论创新，既是中国共产党生命力的象征，也是其自我“调适”成功的标志。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政党必然是一个勇于创新、勇于突破旧思维的政党。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表现了超常的能力。例如，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都是前无古人的创造，且其形成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此基础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抗日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多方面展开达到了成熟；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等文献中及时提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蓝图，提出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这都充分体现了党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理论创造能力及与时俱进的特征。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邓小平到每届新的中央领导人都“要求全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目的就是要使中国紧紧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使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①。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大胆创新，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从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其间又经过几次党代会直到十八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逐步完备起来并具备了十分丰富的内容。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特征。

（三）以“自我净化”“自我革新”克服消极腐败和脱离群众的病症，维护自身肌体健康

消极腐败和脱离群众是危害党的生命的最大祸患，是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的主要课题。

第一，中国共产党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官僚主义，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群众基础就是党生存的基础，党一旦脱离群众就意味着其生命的终止。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痛恨官僚主义，并与之做坚决的斗争。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形成了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优良作风，所以才能动员千百万群众参加革命。夺取政权后，中国共产党依然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

^①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78页。

点和归宿。”^① 所以，党始终警惕和防止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问题。1957年，毛泽东在阐述整风的目的时指出，“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判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② 克服官僚主义，坚持走群众路线，在党的文献及党的领导人著述中随处可见。近年来党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通过党内法规的实施和完善，即实施六项禁令、八项规定，以及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互动等措施，克服脱离群众的现象，取得了良好效果。这就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自我“调适”的典型表现。

第二，以自我净化克服消极腐败，保持自身的纯洁性。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先进政党，将腐败视为最大危险。任腐败泛滥，就会葬送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所以，治理腐败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自我“调适”的一项重要任务。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领导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1945年7月，毛泽东在同黄炎培谈到共产党如何跳出由盛而衰的历史周期律时，提出了依靠民主、依靠人民监督政府，防止消极腐败现象发生的重要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及时提醒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建国初期，为了保持党和国家机关清正廉洁，发起“三反五反”运动以及“打虎”斗争，遏制了腐败的滋生和蔓延，使党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形象。邓小平说：“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这也是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消除腐败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并下大力气通过自我净化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四）依靠自我“调适”实现内部的团结和统一，保证自身组织稳固

政党内部的团结统一和组织的稳固是其生命存在的根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反对分裂主义、宗派主义、维护内部的团结和统一，这也是其自我“调适”的重要内容。组织稳固是一切政党追求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其建党原则决定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因此，中国共产党不容许任何分裂党的现象存在。毛泽东曾指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

^①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72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3~314页。

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①这也是党在历史上曾多次开展反对分裂党的路线斗争的原因之一。尽管这种“调适”的方式也付出了相应代价，发生了某些偏颇，但对消除分裂主义的祸患、保证党的巩固、维护党的生命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艰巨而伟大的事业，它要求中国共产党本身达到高度统一，形成强大合力，进而凝聚全民族的力量。这在中国革命中表现尤为突出。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就在于全党的紧密团结。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更加明确和严格要求其全体成员自觉维护党的团结和中央的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反对宗派主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才保证了我们这个具有八千七百万党员的大党的稳固和持续健康发展。

三、中国共产党具备自我“调适”的内在优势和有效武器

既然自我“调适”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之道，那么，中国共产党何以能成功实现自我“调适”？

（一）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自我“调适”的内在基因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和力量之所在。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组织，它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且承担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并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宗旨。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具备其他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都不具备的内在基因，即它的组织及其成员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因而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包括生命，更何况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人不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②。例如在遵义会议上，党能够迅速实现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调整，前提就是当时中央领导人敢于直面和承认自己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由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造成的。如果没有这种勇气，就不会迅速扭转危局。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党能够实现历史的重大转折，前提是充分认识并承认自己的错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就多次承认自己在党过去所犯的错误中有责任。当1987年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7页。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他曾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① 正因为他带头反思过去的错误，深刻总结经验教训，才有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成功。

总之，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② 勇于面对自身的错误并“随时随地”纠正错误，勇于承担责任，是党自我“调适”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

（二）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及时进行自我“调适”的前提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敌强我弱的状态下；革命胜利后，巩固政权、建设政权需应对来自外部多种敌对势力的威胁；搞建设又面临国情复杂、生产力落后的困境，而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又走过弯路，这造就了共产党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始终认为要奋斗就会有困难有风险。这种忧患意识使党能够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发现问题。这是实现自我“调适”的前提。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我们的工作成绩是很显然的，毫无疑义的。但是同时，我们的工作中依然存在着缺点。谁要是只看见成绩一面，不看见缺点一面，谁也就不会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③ 正是坚持这一思维，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始终把握思想教育的武器，坚持改造自己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以保持自我“调适”的常态化，特别是党在自身建设上做到警钟长鸣。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多次警示全党，“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以后还会遇到风险、困难，包括我们自己还会犯错误。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做的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④ 由于有了这种忧患意识，我们推进改革开放不用休克疗法。我们讲摸着石头过河，是及时发现问题进行调适的一种形象表达。近年来，在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更是要求全党保持头脑清醒，及时发现和解决前进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201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在讲话中又提出党执政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及其应对的策略，尤其指出腐败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在全党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并运用法制的力量实施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9页。

强力反腐。可见，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实现自我“调适”的前提。

（三）中国共产党具备自我“调适”的两大武器

中国共产党能成功地进行自我“调适”，关键在于恰当地运用了自我“调适”的两大武器：一个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另一个是民主集中制加铁的纪律。

第一，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①批评和自我批评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自我“调适”的武器，就在于它是建立在科学机制基础之上的。首先，它与发扬党内民主过程相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说，“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②其次，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方法。其出发点是治病救人，目的是为了弄清思想，分清是非，纠正错误，最终达到党内的团结和统一。再次，长期以来，我们解决党内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矛盾，形成了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这一公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才及时纠正了错误，消除了错误思想的影响，维护了党的统一性和纯洁性。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典范。遵义会议上与会者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给予了严厉批评。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矛头直接指向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当时错误领导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③王稼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都对博古的总结报告进行了批评，博古也做了一定的自我批评。会议虽然批判了博古的错误，但仍保留他中央领导成员的身份。由于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遵义会议才顺利地实现了党在军事上和组织上一次成功的“调适”。

第二，民主集中制原则及严密的组织纪律性。民主集中制原则及铁的纪律，既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其实现自我“调适”的有效武器。首先，民主集中制的实施是以广泛发扬民主为前提的。民主集中制的目的是发挥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6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8页。